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

冯培红 著



浙江
人民
出版社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

冯培红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 / 冯培红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3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 / 柴剑虹, 张涌泉, 刘进宝主编.)

ISBN 978-7-308-16410-8

I. ①敦… II. ①冯… III. ①敦煌学—研究 ②西北地区—地方史—五胡十六国时代 IV. ①K870.64 ②K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3235 号

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

冯培红 著

-
- | | |
|-------|--|
| 出品人 | 鲁东明 |
| 总编辑 | 袁亚春 |
| 丛书策划 | 黄宝忠 宋旭华 |
| 责任编辑 | 胡 畔 (llpp_lp@163.com) |
| 责任校对 | 张小萃 |
| 封面设计 | 项梦怡 |
| 出版发行 |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
| 排 版 |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
| 印 张 | 12 |
| 字 数 | 320 千 |
| 版 印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308-16410-8 |
| 定 价 | 38.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资助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柴剑虹 张涌泉 刘进宝(执行)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惠民 卢向前 冯培红 许建平 刘进宝* 刘 波

张先堂 张涌泉 赵声良 施新荣 柴剑虹

(加*者是本册责任编委)

总 序

浙江,我国“自古繁华”的“东南形胜”之区,名闻遐迩的中国丝绸故乡;敦煌,从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便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世界四大文明交融的“大都会”。自唐代始,浙江又因丝绸经海上运输日本,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浙江与敦煌、浙江与丝绸之路因丝绸结缘,更由于近代一大批浙江学人对敦煌文化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传播、弘扬而令学界瞩目。

近代浙江,文化繁荣昌盛,学术底蕴深厚,在时代进步的大潮流中,涌现出众多追求旧学新知、西学中用的“弄潮儿”。20世纪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流散而兴起的“敦煌学”,成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者首先“预流”者,即是浙江的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导夫先路”,几代浙江学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奋随其后,薪火相传,从赵万里、姜亮夫、夏鼐、张其昀、常书鸿等前辈大家,到王仲荦、潘絮兹、蒋礼鸿、王伯敏、常沙娜、樊锦诗、郭在贻、项楚、黄时鉴、施萍婷、齐陈骏、黄永武、朱雷等著名专家,再到徐文堪、柴剑虹、卢向前、吴丽娱、张涌泉、王勇、黄征、刘进宝、赵丰、王惠民、许建平以及冯培红、余欣、窦怀永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学术追求,也有各自的学术传承与治学品格,在不

同的分支学科园地辛勤耕耘，为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发展与丝路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浙江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者，成为国际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研究领域举世瞩目的富有生命力的学术群体。这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始创于1897年的浙江大学，不仅是浙江百年人文之渊藪，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英才辈出的名校。其百年一贯的求是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而又敢于创新的学者专家。即以上述研治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的浙江学人而言，不仅相当一部分人的学习、工作与浙江大学关系紧密，而且每每成为浙江大学和全国乃至国外其他高校、研究机构连结之纽带、桥梁。如姜亮夫教授创办的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4年受教育部委托，即在全国率先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培养了一批敦煌学研究骨干；本校三代学者对敦煌写本语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浙江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精诚合作，在运用当代信息技术为敦煌石窟艺术的鉴赏、保护、修复、研究及再创造上，不断攻坚克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原语言文学分会基础上成立的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也已经成为与甘肃敦煌学学会、新疆吐鲁番学会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术平台。由浙大学者参与主编，同浙江图书馆、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编撰的《浙藏敦煌文献》于21世纪伊始出版，则在国内散藏敦煌写本的整理出版中起到了领跑与促进的作用。浙江学者倡导的中日韩“书籍之路”研究，大大丰富了海上丝路的文化内涵，也拓展了丝路文化研究的视野。位于西子湖畔的中国丝绸博物

馆,则因其独特的丝绸文物考析及工艺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优势,并以它与国内外众多高校及收藏、研究机构进行实质性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享誉学界。

现在,我国正处于实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起步阶段,加大研究、传播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的力度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这对于今天的浙江学人和浙江大学而言,是在原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如何进一步传承、发扬学术优势的问题,也是以更开阔的胸怀与长远的眼光承担的系统工程,而决非“应景”、“赶时髦”之举。近期,浙江大学创建“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举办“丝路文明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迈出的坚实步伐。现在,浙江大学组织出版这一套学术书系,正是为了珍惜与把握历史机遇,更好地回顾浙江学人的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历程,奉献资料,追本溯源,检阅成果,总结经验,推进交流,加强互鉴,认清历史使命,展现灿烂前景。

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编委会

2015年9月3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所选辑的论著写作时间跨度较长,涉及学科范围较广,引述历史典籍版本较复杂,作者行文风格各异,部分著作人亦已去世,依照尊重历史、尊敬作者、遵循学术规范、倡导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经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协商,书系编委会对本书系的文字编辑加工处理特做以下说明:

一、因内容需要,书系中若干卷采用繁体字排印;简体字各卷中某些引文为避免产生歧义或诠释之必需,保留个别繁体字、异体字。

二、编辑在审读加工中,只对原著中明确的讹误错漏做改动补正,对具有时代风貌、作者遣词造句习惯等特征的文句,一律不改,包括原有一些历史地名、族名等称呼,只要不存在原则性错误,一般不予改动。

三、对著作中引述的历史典籍或他人著作原文,只要所注版本出处明确,核对无误,原则上不比照其他版本做文字改动。原著没有注明版本出处的,根据学术规范要求请作者或选编者尽量予以补注。

四、对著作中涉及的敦煌、吐鲁番所出古写本,一般均改

用通行的规范简体字或繁体字,如因论述需要,也适当保留了一些原写本中的通假字、俗写字、异体字、借字等。

五、对著作中涉及的书名、地名、敦煌吐鲁番写本编号、石窟名称与序次、研究机构名称及人名,原则上要求全卷统一,因撰著年代不同或需要体现时代特色或学术变迁的,可括注说明;无法做到全卷统一的则要求做到全篇一致。

书系编委会

目 录

我与敦煌学及河西史研究	1
归义军官吏的选任与迁转	
——唐五代藩镇选官制度之个案	15
归义军镇制考	105
汉唐敦煌大族与西域边防	187
敦煌大族与五凉王国	237
粟特人与五凉王国	336
后 记	368
又 记	372

我与敦煌学及河西史研究

盘点自己廿年左右的学术历程,研究范围基本上限定在敦煌学、河西史、官制、家族等领域,时代从魏晋十六国到隋唐五代阶段。即便是研究官制、家族,我的学术重心也是以敦煌为主,因此专业应当定位在敦煌学、河西史范畴。

—

接触历史并以之为专业,应该是从1990年考入杭州师范学院(今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不过那时学习的是广义的历史学,而对敦煌学、河西史并不熟悉,顶多是在上“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宗教学”等课程时,了解到一些相关知识。在肖也珍教授的指导下,我撰写了本科毕业论文《论唐高祖李渊》,阅读了《大唐创业起居注》、两《唐书》部分纪传、《资治通鉴》隋唐纪,以及一些今人的相关著作,对隋唐史颇有兴趣,所以想报考魏晋隋唐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那个时候自然也不会想到敦煌学。班主任张卫良教授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热心地推荐我报考兰州大学,并帮助我联系齐陈骏教授为导师。于是,我给齐老师写信,询问报考硕士生的情况。令我感动的是,齐老师很快回信并寄来了兰州大学的招生简章,当时的招生专业是历史文献学,他告诉我这个专业主要学习魏晋隋唐史与敦煌学,并让我报考他和楼劲老师合招的硕士生,还说他和楼老师都是浙江人。

因为这一机缘，我才开始接触敦煌学书籍，但也只是阅读了姜亮夫先生的《敦煌学概论》、《莫高窟年表》等书，仅仅是初窥门径罢了。

1994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硕士，因为刘永明师兄也报考了齐、楼二师的硕士生，所以我被调剂到齐老师和郑炳林老师的名下。齐师精研魏晋隋唐史与河西史，郑师主攻敦煌文献，他们的治学领域对我影响甚大，以至于我至今仍然耕耘在敦煌学、河西史及魏晋隋唐史的学术领域，这让我从内心里无限地感恩师恩。

20世纪90年代中期，凡事简约，环境安静，是读书求学的好时光。老师们也不像现在这样忙碌，师生之间接触极多。每周除了上课外，我还经常去老师家里聆听受教，这是现在的学生难以享受到的奢侈事情。入学之初，我抄录了一册《四库全书总目》，作为自己读研期间的阅读指引。同时受齐老师的学术影响，我把汉宋之间的正史、《资治通鉴》等传统史籍系统地通读一过，算是积累了一点历史学的基础知识；对于敦煌文献，我从阅读郑老师的《敦煌碑铭赞辑释》、《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开始入手，如今每次翻阅被读得韦编三绝的老师之书，就深深地感念老师对我初入敦煌学门槛的学术引领。那个时候，唐耕耦、陆宏基先生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卷本是能借到的最好的敦煌学书籍，伴随着我的学术成长。

硕士阶段，齐老师给我们这级硕士生开设了“历史文献学概论”、“敦煌学概论”、“河西史研究”等课程，郑老师讲授了“敦煌文献校勘释读”课程，陆庆夫老师讲授了“敦煌民族文书研究”、“吐鲁番学概论”两门课，特别是楼劲老师的“魏晋隋唐史专题”课特受大家的欢迎，竟然连续开了两个学期，当时那种时髦的、洋式的教学方式，对我们的学习是绝好的训练。记得有一次在楼师

家中深夜话谈,直到子夜一点,他教诲我如何去阅读魏晋南北朝正史,怎样做笔记和思考学术问题,比如说“要用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材料,去说明最应该说明的问题”之观点,至今我仍然深受教益。

老师们的课堂讲授,自己对史籍与敦煌文献的阅读,使我得以在当年有着良好学术氛围的环境里,系统地学习了敦煌学、河西史与魏晋隋唐史等领域的知识。

硕士一年级时,我在郑老师的指导下撰写了论文《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后来联名发表在《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上。虽然论文比较稚嫩,但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五易其稿、约十万字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抄写,对我这个初学者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学术训练。郑老师为我提供敦煌文献材料,指点我如何写作,引导我走向敦煌学的学术之路。同年,我还独立发表了一篇题为《河西商镇话沧桑》的小论文,则是追随齐老师研究河西史的初步尝试。

1996年,我在齐老师的指导下,合作或独立发表了《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政权中“十将”及其下属诸职考》、《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中队职问题辨析》二文,试着对归义军基层军队中的武将制度进行初步探讨。这时,郑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唐五代宋初敦煌归义军史研究”获得批准。听他说,这个项目共分为政治、官制、经济、民族、宗教五卷,除官制外的四卷分别由齐、郑、陆老师及杜斗城老师负责,并让我承担官制卷。当时我只是一个三年级硕士生,得列承担重点项目,虽然感到压力极大,恐难胜任,但也倍感荣幸,愿意多加努力,这要特别感激郑老师的信任、扶持和提携。我在硕士求学阶段发表的九篇论文,大多属于敦煌学范围,特别是对归义军官制的研究,硕士论文题为《归义军军将考释》,从初稿21万字压缩到了7.3万字,主要是对史载缺略的武职军将进行先期研究。

如今回忆廿年前的西北求学，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门外汉，能够踏入敦煌学的门槛，并略窥河西史领域，是与两位导师的悉心指导分不开的。

二

1997年，我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被分配在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我担任了1997级世界史的班主任，但不能给历史系的本科生上课，只好给哲学系、新闻系的新生讲授“中国通史”课程。翌年，我从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转到敦煌学研究所，当时所里有七位老师，对我来说他们都是老师一辈，只有我一个年轻人。除了给外系上课、编辑《敦煌学辑刊》外，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由读书与写作，希望能进一步夯实敦煌学、历史学的基础。

读硕士的时候，敦煌所的资料室除上课外，平时都是锁门的，当时只能从学校图书馆或历史系资料室借阅书籍。就敦煌文献而言，只能借到《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与各种敦煌文献整理本著作。调到敦煌所工作后，我才得以方便地在资料室看书。除了《敦煌宝藏》、缩微胶卷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所藏的敦煌文献陆续影印出版，这为我进一步学习敦煌学提供了良好的资料条件。为了制作“敦煌官名索引”，我利用在资料室看书的便利，开始着手普查敦煌文献。在参加工作的头两年里，除了继续发表一些归义军官制论文外，在敦煌学领域中我还撰写了《P. 3249背〈军籍残卷〉与归义军初期的僧兵武装》、《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申论》、《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籍帐、契约等专项文书看3—9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法制氛围》、《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从敦煌文献看归义军时代的吐谷浑人》等论文，后来陆续发表在《敦煌研究》、《历史研究》、《兰州

大学学报》等刊物上。

1999年,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的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专业博士点获得批准并开始招生。我考到郑老师和施萍婷研究员的门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在归义军军将的基础上,自然延伸到包括文职僚佐、地方职官在内的整个归义军官制。读博期间,虽然老师们不再上课,但敦煌学研究所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常聘请校外的学术名家来兰州大学讲学,如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郝春文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赵和平教授、中国文物研究所邓文宽研究员、美国密歇根大学宁强教授等,讲学时间多者月余,少者一周。尤其是陈老师两度来兰讲学,第二次遭逢2003年“非典”,讲学结束后不得不继续滞留兰州,一直讲到夏天,足足讲授了一个学期的课程。感谢这些校外老师教给我们丰富的历史知识、独特的治学方法,让偏处西北的兰大学子开拓了学术视野,受益匪浅。另外,施老师在2000年暑假带领她指导的博士生参观莫高窟,不顾年迈劳累,连续七天讲解了97个洞窟,真是一道独特的授课风景,至今我仍感念不已。

读博士应该是专心致志的,虽然我是在职读博,同时从事中国古代史方面的教学工作,但博士论文始终围绕着归义军官制来进行,论题集中,自己也完全沉浸在敦煌学领域中的这个小圈子里。2002年论文写作完毕,但自己觉得不太满意,加上学校研究生院希望我能延期答辩,以充分的时间写好论文,所以我又申请延长了两年。到2004年,我提交了博士论文《敦煌归义军职官制度——唐五代藩镇官制个案研究》,申请答辩。论文分为归义军节度使、其他诸使、文职僚佐、武职军将、地方职官等部分,通过对敦煌文献所见各个官职的考证探讨,尽可能地复原归义军藩镇的职官制度,重现了以节度使为首的藩镇幕府的文武僚佐及地方军

政职官的组织体系；同时以归义军为个案，结合唐朝的制度规定，考察唐宋之际藩镇官制的一般状况，以填补史籍对藩镇官制记载的空白。论文对归义军职官所做的钩稽考证，不仅是职官制度本身的需要，同时也对归义军历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博士论文的同行评议与答辩，得到了荣新江、李正宇、姜伯勤、张国刚、朱雷、李并成教授等学界前辈的肯定和鼓励，同时也指出了很多不足之处。我希望能借此向他们表达衷心的感谢，因为无论是鼓励还是批评，都鞭策着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地自我反思，进一步修改完善博士论文。

三

从1994年到2004年的十年间，从硕士到博士，我的求学之路主要围绕着敦煌学特别是归义军官制这个中心来进行，这是因为学位论文必须专精集中所要求的。到博士毕业以后，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可以自由地探索学问了，可以拓宽一下学术领域，放手去写一些篇幅较大的、比较“过瘾”的论文。2005年我申请去四川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希望能到蜀中安静读书。感谢项楚教授欣然同意接受，但因为兰州大学方面突然改变意见，入蜀之行遂成泡影。不久我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于2006—2007年到日本大阪大学跟随荒川正晴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同时接受森安孝夫教授的指导，终于获得了宁静而充实的读书求学时光。

最近十年来，敦煌学依然是我学术耕耘的主要领域，只不过对归义军官制研究加以深化，同时开展敦煌大族与地域社会的研究，以及对部分敦煌文献的考证。归结起来，主要从事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